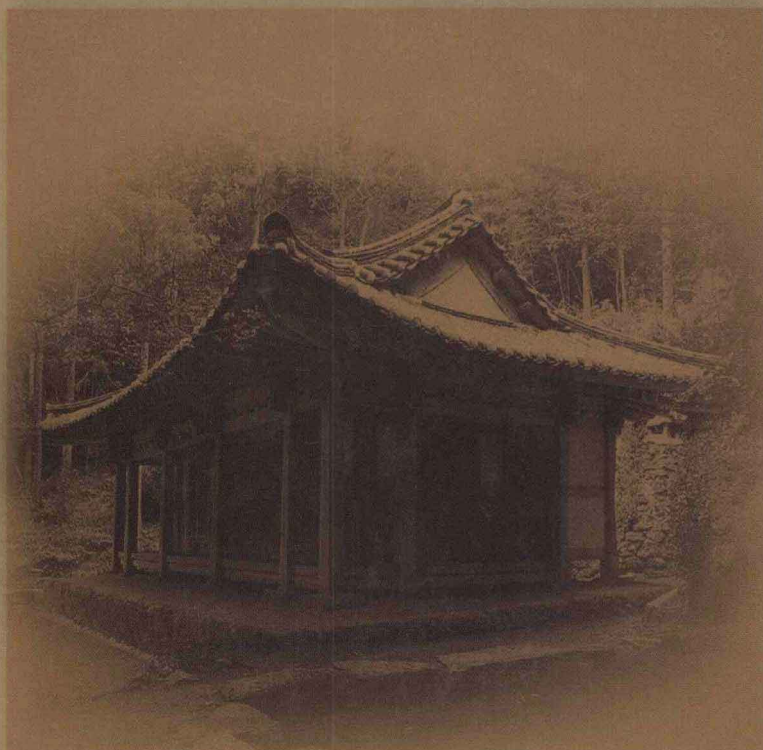


東亞儒學研究叢書 05

朝鮮儒者丁若鏞的四書學

以東亞為視野的討論

蔡振豐◎著



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東亞儒學研究叢書 05

朝鮮儒者丁若鏞的四書學

以東亞為視野的討論

蔡振豐◎著



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朝鮮儒者丁若鏞的四書學：以東亞為視野的討論 / 蔡振豐著.

--初版--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10 [民99]

384 面；15 * 21 公分. (東亞儒學研究叢書；5)

含名詞索引及人名索引

ISBN: 978-986-02-2541-9 (精裝)

1. 丁若鏞 2. 四書 3. 學術思想 4. 儒學 5. 研究考訂

132.58

99002413

統一編號 1009900747

東亞儒學研究叢書 5

朝鮮儒者丁若鏞的四書學：以東亞為視野的討論

著 者：蔡振豐

策 劃 者：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 (<http://www.eastasia.ntu.edu.tw>)

出 版 者：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發 行 人：李嗣涔

發 行 所：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http://www.press.ntu.edu.tw>)

法律顧問：賴文智律師

展 售 處：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10617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

電話：02-23659286 傳真：02-23636905

E-mail：ntuprs@ntu.edu.tw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電話：(02) 2518-0207

國家網路書店 <http://www.govbooks.com.tw>

五南文化廣場 電話：(04) 2226-0330

責任編輯：陳靜芳

封面設計：申朗企業有限公司(<http://lyonfish.myweb.hinet.net>)

出版時間：2010年2月初版

定 價：新臺幣300元整

GPN: 1009900747

ISBN: 978-986-02-2541-9 (精裝)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黃序

《朝鮮儒者丁若鏞的四書學：以東亞為視野的討論》這部書，是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蔡振豐先生近年來研究東亞儒學的重要成果。承蔡先生的好意讓我先拜讀全書稿本，並希望我寫下讀後感言作為本書的序文，我很高興看到蔡先生這部著作的出版，自然樂於從命。

海峽兩岸中文學術界關於朝鮮儒學的研究，尚處於起步的階段，有關丁若鏞（茶山，1762-1836）的研究論著更少，現在蔡先生這部書的出版，為中文學術界的朝鮮儒學研究向前推進一大步，功不可沒。

我通讀這部書稿，為振豐在朝鮮儒學與茶山學研究所做出的卓越成績感到欣喜不已。我覺得，這部書最突出的成就有三：

第一，本書將丁茶山的四書學置於東亞儒學的廣袤視野中進行比較研究，並衡論其價值。丁茶山是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期朝鮮儒學實學派思想家，除了政治事功外，畢生遍注群經，著述宏富，如《周易四箋》、《易學緒言》、《論語古今注》、《孟子要義》、《中庸自箴》、《大學公義》、《喪禮四箋》、《經世遺表》、《牧民心書》等書，均收入《與猶堂全書》¹，在東亞儒學史上有其既承舊而又開新的地位。

丁茶山以注解的形式重新解釋儒家經典，貌似守舊實則開

¹ 《與猶堂全書》共 20 卷，首爾：民族文化文庫，1963 年，2001 年。

新。如何恰如其分地衡斷丁茶山在東亞儒學史的地位？這是重要的研究課題。振豐在本書中對丁茶山四書學的析論，完全從第一手資料出發，不僅對茶山四書學進行細緻的探討，而且也建立一套宏觀的論述。本書將丁茶山的四書學放在廣袤的東亞儒學視域中加以考量，除了將丁茶山的四書詮釋與中國學者互作比較，更取之而與日本古學派伊藤仁齋及荻生徂徠的四書解釋對勘，以突顯丁茶山四書學的特殊之處。振豐自言他之所以選擇與日本古學派作比較研究，實著眼於丁茶山自言受古學派的影響甚深，而且茶山的四書註解中亦多有引用日本古學派儒者的意見。

正因為振豐很成功地将丁茶山放在東亞儒學的脈絡中分析，所以他能從比較的視野為茶山思想定位。朱子學是東亞近世儒學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朱子既將漢唐諸儒及北宋諸老先生的學問融於一爐而冶之，又為此後東亞儒者建立新典範。自十三世紀以後，東亞各國儒者可以闡朱、諍朱，可以反朱、批朱，但絕不能繞過朱子而建立學問體系。自十七世紀以後，日韓諸儒早年多半浸潤於朱子學之中，中年以後始起而反朱，德川日本古學派之反朱子四書學的跡象尤為明確。丁茶山的四書學在過去許多學者的著作中亦多被歸入反朱子學的陣營，然而，振豐經過詳細研究之後告訴我們：丁茶山雖然反對朱子的「理」、「氣」架構，但並不反對朱子所提出的「人心」、「道心」的區分，茶山對《四書》在儒學史上的貢獻也大致遵從朱子的判斷，所以，振豐認為茶山的四書學不應被歸入東亞近世的「氣學」或「反朱子學」的陣營，而應以「後朱子學」視之。振豐

在本書所提出的上述看法應該是可以成立的。

本書第二點貢獻在於釐清茶山四書學之基本性質仍與天主教義有相當差距。十七世紀以後，隨著西學東來，東亞儒者開始與猶太基督宗教文化有所接觸，各國儒者的《四書》詮釋間或出現西學及西教之思想問題，由於丁茶山曾接受天主教，因此茶山四書學中所見的「性」、「天」、「上帝」等概念是否受天主教的影響，在韓國學界至今仍是爭訟不休的問題。振豐在本書中透過茶山四書學的理論類型及其四書詮釋文本的分析，認為丁茶山的四書學接近於洙泗舊學，而遠於天主教義，對於西學在茶山思想中的角色，頗有釐清之效果。

本書第三點貢獻是將茶山思想放在東亞從「傳統」向「近代」轉化的光譜之中衡量。振豐在這個問題意識上取徑於二十世紀日本思想史重要前輩學者丸山真男（1914-1996）的學說。丸山真男建立德川思想史的發展循「宋學→山鹿素行、伊藤仁齋→荻生徂徠→本居宣長」的系譜。丸山真男指出：徂徠學的興起瓦解了作為德川日本封建體制之意識型態基礎的朱子學思維方式，奠定日本的近代意識）。²丸山真男的學問以十九世紀德國觀念論與 1960 年代以後歐美學界的現代化理論作為背景，他的學說雖然受到他的晚期弟子及並世學者的批判，但仍是研究東亞儒學的人所不可不參考的學說。振豐從丸山真男的問題意識出發，他在本書中主張丁茶山的四書學雖不是完全站

² 參看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6 年）

在「反朱子學」的立場，但也未必不能展現近代意識。振豐在本書中提出三點細部論證：第一，本書認為丁茶山的天人觀並不是天命下貫式的天人觀，因此不應被理解為「自然」的「天人的連續性思維」。第二，丁茶山強調孟子的心性論，帶出了道德行為或行動而產生的「善」，而非自然而有之善。第三，丁茶山除了強調主體性外，亦強調主體間性，除了賦予茶山所論的「禮樂刑政」的依據之外，也具有部分的「社會契約論」的雛形。本書提出的這三項論述值得我們思考。

整體而言，海峽兩岸中文學術界關於東亞四書學的研究論著，仍以中國朱子學與四書學的著作為數最多，有關德川日本四書學的研究論著次之，而且集中在日本古學派諸儒的四書學，有關朝鮮時代朝鮮四書學研究最少。蔡先生這部新著的問世，正好彌補了東亞四書學研究的這個重大缺口，其有裨益於學界自不待言。我欣喜於本書的出版，更期待本書帶動更多朝鮮儒學新論著的問世。

黃俊傑

序於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2010年1月6日

朝鮮儒者丁若鏞的四書學： 以東亞為視野的討論

目 次

黃序	i
第一章 問題與方法	1
第一節 四書學的方法概念	1
第二節 時代的轉折與朱熹四書學在東亞的變化	12
第三節 丁若鏞在東亞學術上的意義及本書的章節安排	31
第二章 丁若鏞與朱熹四書詮釋取向之異	41
第一節 注解的內容與詮釋的進路	41
第二節 朱熹與丁若鏞的詮釋之異：以《論語》中 對管仲的評價為例	45
第三節 義理取向的詮釋系統與意義取向的詮釋系統	62
第四節 四書的文本結構內含兩類詮釋的系統	72
第三章 丁若鏞人性論與洙泗學、朱子學及西學間的距離	79
第一節 對丁若鏞學術定位的二種看法	79
第二節 丁若鏞性嗜好說的來源及特色	84
第三節 丁若鏞的心性論及其上帝一詞的使用	92
第四節 性三品說在丁若鏞四書學中的理論位置	99

第五節 丁若鏞的人性論為對孟子心性論的回歸.....	108
第四章 人性論的延伸：丁若鏞四書詮釋中「仁」、「心」 、「性」、「天」的理論意義.....	113
第一節 圍繞在孔子仁說中的重要概念.....	113
第二節 丁若鏞「仁說」中「交互主體」的動、靜二態義 ...	114
第三節 由主體性到交互主體性：「嗜好之性」 與「可仁之理」	129
第四節 「性、道、教」解釋架構下的「天」、「人」 關係與「天」在丁若鏞思想中的理論地位	138
第五節 「仁說」及「事天說」為對主體性、交互 主體性與超越性的追求	149
第五章 主體性與交互主體性的開展：丁若鏞的文質論.....	153
第一節 以王者的禮樂刑政為主之儒學解釋與 丁若鏞論說的傾向	153
第二節 朝鮮學者對文質問題的三種解釋傾向	157
第三節 星湖李滉對「忠、質、文」的考辨及其影響.....	168
第四節 丁若鏞文質論的要義.....	178
第五節 丁若鏞文質論的價值.....	186
第六章 丁若鏞《中庸》詮釋之特色： 與日本古學派的對比.....	193
第一節 對《中庸》的質疑及定位.....	193
第二節 日本古學派對《中庸》的詮釋.....	199
第三節 伊藤仁齋與荻生徂徠《中庸》詮釋的思想史意涵 ...	215

第四節 從比較的觀點論丁若鏞的《中庸》詮釋.....	222
第五節 丁若鏞與日本古學派在詮釋上的差異.....	238
第六節 丁若鏞對日本古學派的態度.....	249
第七章 丁若鏞的《大學》詮釋及其四書學架構.....	253
第一節 《大學》的價值與日本古學派的看法.....	253
第二節 丁若鏞的《大學》詮釋.....	257
第三節 由丁若鏞《大學》詮釋論其四書架構.....	279
第四節 丁若鏞對四書學的整體構想.....	286
第八章 結論.....	297
第一節 從東亞儒學的發展論丁若鏞四書學的發生意義.....	297
第二節 丁若鏞四書學在東亞儒學中的意義.....	307
第三節 從東亞秩序的變革論丁若鏞四書學的時代意義.....	313
參考書目.....	321
人名索引.....	339
名詞索引.....	345

第一章 問題與方法

第一節 四書學的方法概念

一、朱熹四書學之成立

四書之成爲獨立的學問體系始於朱熹（字元晦、號晦庵，1130-1200）。朱熹爲揭示對儒學體系的構想，繼承二程對《大學》的改訂，將《禮記》中的〈大學〉、〈中庸〉獨立出來，定《大學》爲「初學入德之門」、定《中庸》爲「孔門傳授之心法」，並與《論語》、《孟子》並列爲四書。他爲了明示四書在學問上的緊密與完整，提供了後學研習《四書》的順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了啓發後學，除了作有《大學章句》、《中庸章句》及《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外，還撰寫了《四書或問》爲其解說。朱熹言：「語、孟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¹，可見《四書章句集注》爲他畢生學問的所在，可說是「朱子學」的重要內容。

從儒學的復興運動而言，《四書章句集注》可說是朱熹最重要的工作，其意義可由三個脈絡來說明。

（一）建立起由孔子（《論語》）、曾子（《大學》）、子思（《中庸》）、孟子（《孟子》）的道統傳承，由此道統的傳

¹ 見〔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2冊，卷19〈語孟綱領〉（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437。

承朱熹重新詮釋了儒學的發展。²

(二) 朱熹藉由詮釋《大學》、《中庸》，確立了他自己的「性理世界觀」，並由這個性理世界觀形成了他自己的儒學體系。

(三) 補足儒學的不足，以《中庸》的形上學思想回應由佛學所帶來的思想挑戰。³

基於道統論，雖然自歐陽修以來，學者頗懷疑子思作《中庸》之說⁴及曾子作《大學》之論，然而朱熹爲了補足孔子、曾子、子思、孟子這一道脈，仍極力主張《中庸》爲子思之作，以爲《禮記·大學》之文可判爲經一章、傳十章，經一章爲曾子所作。基於性理的世界觀，朱熹認爲在四書的理論系統中，有「道心／人心」、「理／氣」、「天理／人欲」的區分。「道心」屬「理」，是人先驗的本善，爲具萬理的「天地之性」；而「人

² 道統之說由來已久，然「道統」二字自朱熹始。朱熹《中庸章句·序》不但首用「道統」之詞，且又以哲學思想充實之。自此以後，「道統」乃成爲哲學範疇。朱熹之道統不但上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於伏羲，且於孟子之後添入周濂溪、二程子，而自居其後（「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有聞焉」）。其以道統自任之意，甚爲明顯。此可參見陳榮捷：〈新道統〉，《朱子新探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頁429-435。

³ 朱熹《中庸章句·序》言：「尚幸此書之不泯」，「得有所據，以斥二家（佛、老）似是之非」。見《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6年），頁14-15。

⁴ 歐陽修言：「問：禮樂之書散亡，而雜出於諸儒之說，獨《中庸》出於子思。子思，聖人之後也，其所傳宜得其真，而其說有異乎聖人者何也？〔……〕故予疑其傳之謬也。吾子以爲如何」。見〈進士策問三首之三〉，《歐陽文忠公全集》卷48（《四部備要·集部》第6冊，上海：中華書局據祠堂本校刊），頁3-4。

心」是「理」在「氣」中，為「理氣混雜」的「氣質之性」。在朱子的說法中，氣質之性必然會蒙蔽天理，但這種蒙蔽並不是真正的異化，因而有所謂「復性」的工夫；即主張透過主敬與窮理的雙重工夫，可恢復人本然的純理之性。基於回應佛、老的虛無之論，朱熹乃肯定《中庸》「天命之謂性」，主要在解決孔子倫常之教和性與天道的關係，而「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的觀念，則是通過「誠者，物之始終，不誠無物」的觀念，以解答「中庸」與「性命」的問題。

二、朱熹四書學在東亞的展開

朱熹的四書體系不但成功的重振儒學的聲勢，⁵挾著科舉考試的優勢，也使得朱子之學成為東亞知識階層的基本素養。

朱子學於元代延祐二年（1315）被定為正統之學及科舉考試的範本，⁶這不但確立了朱子學的官學色彩，也使四書有經

⁵ 朱子學不但於宋代大有影響，亦統馭元代的學術發展。此可參見陳榮捷：〈元代之朱子學〉《朱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頁299-329。

⁶ 由《元史》卷81可見當時科舉考試的規定：蒙古、色目人第一場考「經問」五條，由《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注》。第二場考「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漢人、南人第一場考「明經」、「經疑」二問，由《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注》。第二場考「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注疏。由上所述考試的規定不難看出，無論蒙古人、色目人還是漢人、南人，《四書》都是必考的科目，且以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為標準本。有關四書學在元代考試中的地位，亦可參見周春健：〈「延祐科舉」與四書學官學地位的制

學化的趨向。明代繼承了元代將朱子學定為官學的作法，於洪武十七年（1384）頒布〈科舉定式〉，⁷推進了學習文本的標準化。這使得原本在南宋就已開始的《四書章句集注》之疏釋書，⁸因考試之需要及商業的考量，⁹不斷的被編刊成書。¹⁰

朱子學的官學化與四書的經書化的趨勢，同樣也在日本及朝鮮進行。¹¹高麗末期（十三世紀末）安珣（1243-1306）隨忠

度化》，《內蒙古大學學報》第40卷第3期（呼河浩特市：內蒙古大學，2008年5月），頁19-23。

⁷ 〈科舉定式〉的內容為：「初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氏傳及古注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之後，於成祖永樂年間，頒《四書五經大全》，廢注疏而不用。以上參見《明史》卷70〈選舉〉（《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正史56，總冊298，臺北：台灣商務，1986年）頁116上。

⁸ 如真德秀（1178-1235）《四書集編》、趙順孫（1215-1277）《四書纂疏》、祝洙（安道，1256年進士）《四書集注附錄》等。

⁹ 南宋中期以後、尤其是明代後半期的商業性出版十分興盛，此可參見佐野公治：《四書學史的研究》（東京：創文社，1988年）、井上進：《中國出版文化史——書物世界と知の風景》（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2年）。

¹⁰ 如元代胡炳文（1250-1333）有《四書通》、陳櫟（定宇，1252-1334）有《四書發明》（上二書約刊於1330年以前）、倪士毅（1330年前後）改訂《四書發明》而有《四書輯釋》。明代之四書注釋書有：永樂帝於十三年（1415）欽令編纂、刊行，胡廣（1369-1418）等所編之《四書大全》（根據倪士毅《四書輯釋》和吳真子《四書集成》而編成）、《性理大全》、《五經大全》；蔡清（虛齋，1453-1508）的《四書蒙引》（1504年左右刊行）；林希元（1481-1565）《四書存疑》；陳琛（紫峰，1477-1545）《四書淺說》（成書於十六世紀中葉左右）；廬一誠的《四書講述》；王納諫（觀濤）《四書翼註》；張居正（1525-1582）《四書直解》等。

¹¹ 參見李丙燾：《韓國儒學史略》（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86年）；裴宗鎬：《朝鮮儒學史》（川原秀城監譯，東京：知泉書館，2007年）；李魁平：《韓國儒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宣王進入元朝大都，購得了《四書章句集注》並將之帶入高麗，授徒講學。之後，在恭愍王十六年（1367）時有大司成李穡（牧隱，1328-1396）重營成均館，更定學制，分有五經四書齋（後稱九齋），興起宋學。朝鮮王朝時，依高麗之法，設九齋於成均館，科舉考試之經書義，四書主朱子《章句集注》之說。¹²自此之後，朝野讀書人研習四書莫不以朱子為宗。

十五至十六世紀朝鮮引入明代版本刊行《性理大全》、《四書五經大全》、《朱子文集大全》等普及性理學的書籍，其中《朱子文集大全》尤為普遍，被朝鮮的學者規定為必讀書。《朱子文集大全》在朝鮮的主要刊本有：1543 年中宗（1488-1544）下賜給權穰（冲齋，1478-1548）的版本；1575 年柳希春（眉巖，1513-1577）與趙憲（重峰，1544-1592）依李滉（退溪，1501-1570）校戡底本，所刊行的活字印刷本、1635 年元斗杓（灘叟，1593-1664）所刊行的木版印刷本及 1771 年由洪啓禧（澹窩，1703-1771）所刊行的木版印刷本。1588 年李滉挑選《朱子文集大全》之 1700 餘篇書簡，及有關朱熹學問出處之 1008 篇文章，編成《朱子書節要》。《朱子書節要》的普及使朝鮮學者可以在短期內理解朱子學，造成了很大的影響。¹³

¹² 高麗末期及朝鮮初期的科舉制度雖稍有革新，但大體無變。文科即以製述（文藝）為主，講書（經術）為副。世宗六年（1424）時設有明經科取士，成宗（1457-1494）時有「式年」（定期科舉）明經之法，其初試、覆試並以四書、五經。「經書義」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子《傳》、朱子《本義》；《書》主蔡氏傳；《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傳》及其他；《禮記》主陳氏《集說》。其制度大體倣效明制而行。

¹³ 參見金文植：〈朝鮮本《朱子大全》的特徵〉，《朱子文化》總第 23 期（南

十六世紀中葉以後，由於書院的人才培育及鄉約組織之發揮效用，程朱之學開始在朝鮮扎根開花，這個時期的學者力主探求性理學理論，因而深刻的研讀《性理大全》、《朱子大全》、《朱子書節要》、《朱子文錄》、《心經》等典籍。此時期的學者在哲學上的論辯，可以主理派的李滉、成渾（牛溪，1535-1598）及主氣派的奇大升（高峰，1527-1572）、李珥（栗谷，1536-1584）之間的四端七情之辨為核心。¹⁴剛開始時退溪與高峰、栗谷與牛溪等的論爭，無疑是出於追求真理的熱情，但隨著退溪與高峰的逝世，這種論爭也作為派別對抗的標幟，而致陷入政治黨爭之中。於是，以退溪理論為淵源的退溪學派（從地域講是嶺南學派）在政治派閥上屬東人（東人又分南人、北人，後來是以南人為主）；繼承栗谷的學派（從地域講是畿湖學派）屬西人（西人又分老論、少論，後來是以老論為主）。

退溪學派與栗谷學派的論爭一直延續數百年，除了主理及主氣之論爭外，¹⁵十八世紀也發生主氣論西人一派所分裂的「人物性同」、「未發純善」說與「人物性異」、「未發即有善惡」說

平：朱子文化雜誌社，2010年1月），頁35-36。

¹⁴ 有關四端七情之辨在臺灣的究成果有：李明輝：《四端與七情：關於道德情感的比較哲學探討》（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及楊祖漢：《從當代儒學觀點看韓國儒學的重要論爭》（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

¹⁵ 主理派從退溪的高足趙穆（月川）、黃俊良（錦溪）、鄭述（寒岡，1543-1620）、柳成龍（西崖 1542-1607）、金誠一（鶴峰，1538-1593）傳到李玄逸（1627-1704）、李哉（1657-1731）。主氣派則經由栗谷的弟子金長生（1548-1631）、金集（1574-1656）傳到宋時烈（尤庵，1607-1689）、宋浚吉（1605-1689）、朴世采（1632-1695）和權尚夏（遂庵，1641-1721）。

之間的爭論。¹⁶由這些發展皆可見朱子學的深化及發展，實為朝鮮儒學的主流。除了朝野學者以朱子學為正學外，李朝帝王亦無不身體力行，率先垂範，其中尤以正祖（1752-1800）一朝為甚。正祖曾於 1798 年 4 月經延講學時，向群臣追述其一生究心於朱子學的經歷。¹⁷由此可見，當清代乾隆、嘉慶兩朝朱子學衰退之際，朝鮮朱子學仍有復興之象。¹⁸

日本傳入朱子學的時間可能早在十三世紀，¹⁹但初期的影

¹⁶ 二派的論爭開始於肅宗 35 年（1705）前後，最終形成黨爭。「人物性同」論以李東（巍巖，1677-1727）為代表，因其主張者有金昌翁（三淵，1653-1722）、李緯（陶庵，1680-1746）、魚有鳳（杞園，1672-1744）、朴弼周（黎湖）等，由於他們多居於京畿之地，故稱洛學或洛論。「人物性異」論以韓元震（南塘，1682-1751）為代表，從其說者有宋時烈、權尚夏、金昌協（農巖，1651-1708）、尹鳳九（屏溪，1681-1767）等，他們與信從者多居於忠清道，故稱湖論或湖學。

¹⁷ 正祖言：「夫子嘗曰：述而不作。予之平生功夫，在於一部朱書。予年二十時，輯《朱書會選》；又與春桂坊抄定注解；又點寫句讀於《語類》。三十時，編《朱子會統》；又證定故儒臣韓億增所編《朱書》；又編《紫陽會英》及《朱書各體》。四十後，編閱朱書者多；而近年又輯《朱書百選》；而昨年夏秋，取《朱子全書》及《大全》、《語類》，節略句語，又成一書，名曰《朱子書節約》。近又留意於《朱子大全》及《語類》與其外片言隻字之出於夫子之手者，欲為集大成，編為一部全書。待其編成，將別構一室於宙合樓旁，奉安朱子真像，並藏全書板本於其中。予於朱夫子，實有師事之誠，所以欲如是也」。見〈22 年（1798 戊午）4 月 19 日（癸丑）〉，《正祖實錄》卷 48，《朝鮮王朝實錄》（國史編纂委員會，首爾：東國文化社，1955-1963 年）。

¹⁸ 此可參見陳祖武：《〈李朝實錄〉所見乾嘉年間中朝兩國之文獻與學術》，收入鄭吉雄編：《東亞視域中的近世儒學文獻與思想》（臺北：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年），頁 405-423。

¹⁹ 據足利衍述：《鎌倉室町時代之儒教》（東京：有明書房，昭和 45 年）之說，朱子學之傳入日本始於 1212 年日僧俊芿將《四書》由浙江明州（寧波）帶入日本。又，鄭樸生：《朱子學之東傳日本與其發展》（臺北：文史